

京城里的河间会馆

赵华英

清代乾隆年间,北京南城“日南坊”的一处院子,环境清幽,时常举办品茶会友、饮酒高歌的雅集,好一处风雅之所。此地乃河间府文人雅士欢聚之处,纪晓岚等人也经常到此赋诗畅聊、抚琴下棋……这里,就是有名的河间会馆,又称“古瀛会馆”。

壹

乾隆年间的一大壮举

北京有会馆,始于明朝早期,到了清代更为盛行。最早会馆,也称为“试馆”,原本为接济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乡学子,方便其进京参加“会试”时短期住宿、互帮互助而用,所以称为“会馆”。

学子们大多囊中羞涩,在京的故里乡绅或者京官则主动捐资、置地建房,免费供学子们居住。后来,会馆又逐渐成为同乡官员士人定期聚会、联络乡谊的场所。据统计,至清朝末年,全国各地在京城设立的会馆一度达550余座。在北京外城的宣武、崇文区一带,各省各郡会馆云集,在街头巷尾处彼此相连,蔚成一景。

直隶省因为邻近京城的缘故,一直较少有会馆设立。清代顺治年间,曾有直隶省在京士人选定区域建立会馆,可时间一久,就因为失于修缮而废弃。

乾隆年间,京城有位叫舒成龙的官员,是河间府任丘县人。曾在旧会馆居住,感叹旧馆破旧荒废,有心将其修好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乾隆二十四年春天,舒成龙带头捐献白银千两,在京城“日南坊”购买了一座旧宅,立志整修翻新,以作“河间会馆”。

为了把会馆建得像模像样,舒成龙亲自督促施工,“心营手画,日夜不稍倦”,因为众人捐资一时不能到位,他还筹借白银三千两。最终,一个包含厅堂2间、房屋72间、杂舍35间的河间会馆终于竣工了,房舍总计达110间。

会馆内白土刷墙、红粉装饰,还专门修建了一座凉亭,购置了各种厨灶器具,处处整齐肃穆、无不齐全。如此规模的会馆,既能充分接济来京赶考的河间学子,还可以为在京河间籍文人墨客们提供一个欢聚饮宴的好场所。

贰

十一年后的会馆大修

古语说“凡事贵在持久”。舒成龙的可贵之处,不光在于创建河间会馆,更在于之后对会馆的建设、管理仍然尽心尽力。

乾隆三十三年春天,舒成龙从山西雁平道卸任归京,来到河间会馆,发现里里外外的房屋已经年久失修,有的房间破裂倒塌,屋内器具缺少,甚至损坏大半。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同乡会馆已是这般模样,舒成龙喟然叹息,立志修缮,却因为其他事没能立刻实行。

两年后,朝廷在正常科举之外开科取士,士子即将来京考试,河间会馆又要派上大用场了。舒成龙又兴修缮之念,可盘点一下会馆家底,实在有些惨淡。六月初,舒成龙带病来到会馆,从当铺预支取了四年房租,又借贷了千两白银,之后召集工匠、准备材

料,补造器具、增建房屋,糊裱油饰、日夜赶工,终于使会馆内外焕然一新。

之所以如此加紧修缮,是因为七月马上就到,舒成龙生怕因为食宿不周,耽误了河间府的士子们进京赶考。

会馆修好后,七月份,河间府士子进京,仅住进会馆的就有三百余人,可见河间古郡文风之胜。即便这样,因为客满,仍有众多士子而不能住宿于此。

叁

二百多位学子的感念

别小看新添置的河间客寓,工料、器具,得需千两白银才能修缮齐备。舒成龙考虑到借贷过多,恐怕房租难以偿还,于是又捐出银四百两,先修缮部分房屋,后再兴修另一半。河间会馆的右边有一所房子,房主愿意出让,舒成龙又计划买下来,可以作为任丘客馆的书屋。乡试之前较早进京的士子们,可以在其间诵读,还从京城请来名师辅导,酌情发给薪水。

从此之后,整个河间郡的绅士到访京城,可以直接入住河间会馆,“有如归之安,忘羁旅之苦,宿宿信信,皆舒畅顺适而去”,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。

乾隆三十五年秋,河间府的200多位士子举人们感念于舒成龙“敦笃乡谊、不忘桑梓”之美意,特地刻碑立石,以纪念他为河间会馆忙碌十余年,仁至义尽、识远力卓、有始有终。

会馆作为一地士人在京城的“落脚之地”,不光在于“建”,还在于“管”。

创建之初,会馆并没有固定的管理者,而是由河间府在京任职的官员轮流管理,称为“值年”。但是,担任“值年”的京官往往因公务繁忙,顾不上到会馆亲自打理。于是,舒成龙与几位同乡好友共商长久之策。最后,确定请一位专职“馆长”常住馆中,执掌馆务,名为“值客”。

从帐目收支、馆外房租到年度修缮、勘估物料,日常事务由“值客”管理,“值年”仅负责审核,修缮等大事仍由舒成龙酌情定夺。会馆还设立“登名簿”,对往来会馆住宿的河间府同乡,逐一注明乡里籍贯。

肆

会馆文化的活化石

乾隆三十五年,边继祖、纪晓岚、李中简等人亲自拟订《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》,对会馆运行、住客管理均定出详细规章,以为后人遵守。

谁有资格入住会馆?

《规条》明确指出:会馆原为参加乡试、会试的贫寒士人以及在京等候官职的候补、候选官员而设,除此之外,“别有事故者”“概不留宿”。候补的京官入住馆内,一旦任事赴任,一个月左右就应移出会馆,不得常驻在

此,更不得携带家眷入住。如果赶上举行乡试、会试的日期,所有入住的候补官员都应移出会馆,让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优先住宿。

河间会馆中的日常事务由轮流值守者负责,从日常维护到分发客房,每个住馆人都“不得多占,不得拣择”。馆内有六所厨房,几个房间共用一所厨房,不得自设炉灶,以防火灾;馆中设施不得私自移动,如有损坏应照价赔偿。《规条》强调“会馆乃冠裳之地”,要求同居馆内之人互相尊重、讲究礼节,不得藏纳赌具、酗酒生事,更不得招引戏子、缝衣妇女等入内,以维护秩序。

此外,《规条》还对在乡试、会试中取得功名、官职的人规定出不同的捐款数额,以接济同乡贫寒之士或遇有突发事故接济之用。

北京虽然会馆众多,但因为年代久远,流传至今的会馆规章已经不多,这份《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》及《河间会馆值年值客规条》,堪称研究会馆文化的重要档案。

伍

古瀛会馆旧址寻踪

说到此,很多人会好奇追问:河间会馆的旧址在哪里?

在科举时代,会馆曾为河间同乡送往迎、节日聚欢乃至商量善举的知名之地,但在科举停办后,逐渐成为杂居之所,与河间早已失去联系。然而,最近几年来自北京市的会馆资料,则提供了关于河间会馆的一些零碎线索。

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东面,有个骡马市大街,明清时期是个兴盛一时的骡马交易市场。骡马市大街以南,有很多始建于明代的老胡同,胡同里曾云集着全国各地的“驻会馆”。在这些胡同中,有一条南北向西偏斜的曲尺形胡同,名为果子巷。明清时期,这条小巷的南北段有很多售卖干鲜果品的店铺,所以称为果子巷,当年的河间会馆就在这条小巷里,又称为古瀛会馆。

明清时期,北京城区划分为“五城”,即:“中城、东城、西城、南城、北城”,每城下辖若干“坊”,河间会馆即位于南城的“日南坊”。至于河间会馆的具体位置,有资料称在果子巷69号,也有资料称河间会馆在果子巷77号,曾作为北京宣武区房管局办公地点。这些线索,还需要进一步访查、考证,方能确认。

上世纪90年代,北京宣武区政府对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进行盘点测量,出版《宣南鸿雪图志》,其中也记载到果子巷有古瀛会馆。《北京会馆档案史料》载《河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各县县馆房地产清册》(1951年)中记载,“古瀛郡馆 宣外驴驹胡同六号市亩 3.263 共楼房瓦灰房三十五间 同乡分住无租 古瀛郡馆 琉璃厂二四八号 武学书店租用 仅有地皮权”。说明到此时,河间会馆仍保存了多个院落。

驴驹胡同是一条很短的胡同,在地图上如同“对勾”一样,北口与果子巷延续,这条小巷好似一段烟筒的拐脖子,北南段与东西段合并不足百米,北南段叫果子巷,拐

角向西叫驴驹胡同。前述记载的河间会馆门牌编号,出现了“驴驹胡同”与“果子巷”两个版本,可能是因为南北方位不同造成的。

陆

古今名人与河间会馆

碑记资料表明,舒成龙的“会馆工程”曾得到河间府众多名人的鼎力支持。这其中,戈涛、边继祖、纪昀、李中简,还有戈涛的弟弟戈济,其才气都在京城名闻一时,而纪昀还是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。

遥想京城当年,纪晓岚、戈涛等人在河间会馆,定然是“不时小聚、共叙乡情”。而这些名人的诗文作品,恐怕有少在会馆饮宴时的唱和之作。

明清时代,河间府的读书人来到偌大的北京城,或许觉得举目无亲、事事难办,甚至吃不起饭、住不起店。但在河间会馆,各位同乡找到难得的乡井气息,一种全然回到故乡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悠悠数百年,不知多少贫寒的读书人因为河间会馆提供吃住,才度过艰难之日。

河间会馆甚至成为河间士人一个重要的对外联谊平台。道光二十年七月,曾国藩曾移居果子巷居住。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曾专门拜访河间府肃宁人苗仙露,称苗“河间人,精六书谐声之学”,并对河间“君子砖”产生浓厚兴趣,很可能就是他在果子巷居住期间,通过河间会馆与众多河间府名士成为好友的。

如今,北京的数百家会馆大部分已消逝于历史的云烟里,“河间会馆”的遗址也渐渐少为人知。只是,那一段河间府才子们重诚守义、积德累善的故事,永远值得人们赞叹、感怀。



舒成龙遗像